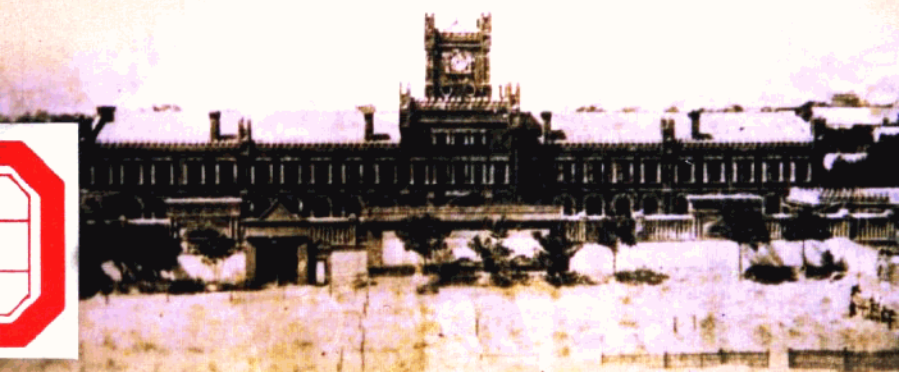


行龙 著

SHANDA WANGSHI SHANDA WANGSHI

往事

山大



山西人民出版社

目录

前身：三立、晋阳、令德堂书院-----	1
5月8日：校庆日-----	6
中西合璧 好事多磨-----	12
大学堂里的“洋教习”-----	19
敦崇礼：西斋首任总教习-----	25
不该忘记的新常富-----	31
译书院及译书考-----	36
五四前后-----	43
新共和学会及《新共和》-----	48
12月23日：三原复课日-----	54
从虎啸沟到克难坡-----	60
学生社团-----	66

《国立山西大学一览》-----	70
1947 年的历史系-----	74
教授会及“集体请假”风潮-----	78
迁校北平 进住瀛台-----	84
老校长徐士瑚-----	90
邓初民:新中国首任山大校长-----	96
1953 年的院系调整-----	102
侯家巷校园回眸-----	106
 附录 山西大学大事记(1901~1953)-----	 111
 后记-----	 127

前身：三立、晋阳、令德堂书院

坊间流行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之类的著作，大多将中国大学的历史追溯至“三代之学”，或从西周“大学”谈起，或从汉代“太学”算起，即如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镇——北京大学的校史，像冯友兰这样的硕学鸿儒也强调：“北京大学的校史应该从汉代的太学算起。”最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各大学纷纷举行校庆，大多将历史尽量往前追溯，甚至有些不惜“改头换面”或“偷梁换柱”。此种现象实是国人“民族自尊”情结的显露：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居然只有百年的“大学史”，实在说不过去；我们的学校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大学的历史往往都有其辉煌的时期），而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资本。

此种建构“悠久历史”的愿望可以理解，但无限地扩张却不值得提倡。因为：中国古代的“大学”或“太学”，与“university”存在巨大差异。中国近代新式大学的建立和大学制度的确立，却是地道的舶来品（参见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版）。近代中国一些新式大学的成立，倒是与前已存在的书院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继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之后于1902年成立的山西大学堂，最初就是由此前设在太原的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合并而成。

“晋阳书院建自前明。”（道光《阳曲县志》）万历初年，

山西按察司副使利用巡抚衙门旧址，增建号舍，筑三贤堂，祀奉讲学河汾、生长于河汾的三位先贤——王通、司马光、薛瑄，以此作为士子学习的榜样，并挂起“河汾书院”的牌匾。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时任山西巡抚的魏允贞在太原府沿西南右所街，又将三贤堂扩大为三立祠，祠奉明贤 55 人，每年按规定日期和仪式致祭。三立书院由此确立。

三立书院最初办得很有成效。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庚子科乡试时，学员考中举人者多达 50 余人。崇祯初年，时任山西提学金事的袁继咸从考生中择录优等生 250 人进入三立书院，并将三立祠名臣、乡贤续增至 71 人，袁为其各著一传，传后加以“袁临侯曰”的评语，名其书为《三立祠传》。袁继咸，字临侯，江西宜春人。办事公正，热心教育。他主持三立书院后，与士子互相讨论，朝夕劝课，生活上蔬食菜羹，与士子一致。袁氏不带家眷，节余薪俸，全数补助寒苦士子。士子得病，亲自慰问，并出医药费用，深得三立书院士子之拥戴。崇祯九年（1636年）当袁氏遭诬陷被逮进京后，以傅山、薛宗周为首的山西百余青年徒步上京，为袁鸣冤，使袁案得以平反，此为有名的“伏阙讼冤”。崇祯十六年（1643年），时任巡抚蔡懋德又对三立书院进行整顿，其中两大措施最为著名：一为聘请知州魏权中、举人韩霖、桑拱阳及傅山来院讲学；二为每月三集，集中讲学。初集讲圣谕，由地方绅士

令德堂书院章程

一	書	分	定	動	所	堂	說	該	經	橋	立	省	每	韻	堂	課
一	役	校	式	用	有	為	前	府	本	頭	令	城	年	修	課	每
議	齊	如	刊	應	疑	該	來	署	部	街	德	令	多	理	卷	月
立	夫	何	印	請	該	道	自	後	院	屋	堂	德	寡	書	每	各
章	還	責	以	書	道	專	應	實	宇	以	為	書	下	院	一	次
程	更	成	及	籍	講	責	速	堂	修	考	札	卷	等	房	官	課
分	雜	教	監	如	編	立	興	造	並	課	行	查	向	屋	課	詩
條	役	院	院	購	功	應	以	飭	工	諸	莫	光	無	之	賦	賦
請	如	駐	論	置	課	詳	期	太	原	生	育	緒	費	五	課	卷
示	何	高	如	藏	脩	章	早	府	所	經	道	十		釐	每	本
酌	添	才	何	度	膳	程	親	陽	委	史	照	年		散	給	價
定	設	如	責	課	卷	支	以	縣	員	古	得	四		給	多	銀
辦	理	應	體	成	日	如	歷	成	查	學	本	月		算	向	五
理	。應	由	體	查	如	何	久	令	具	之	部	巡		無	定	分
又	該	該	查	兼	如	款	行	德	定	所	院	撫				
查	道									原	設	張				
尤										設	鄭					

和乡老参加；再集讲经济，举凡国家大政、地方利害均在讨论之列，从政人员必须参加；三集讲制举，科举应试的士子参加。

明清之际十余年兵荒马乱，山西属于重灾区，三立书院也

受到一定冲击。顺治十七年（1660年），山西巡抚白汝梅鉴于三立祠地势湫隘，又经兵燹，遂在府城东南侯家巷购地，另建三立祠。此次重建的三立书院总面积大为扩展，共花费白银2130余两。雍正十一年（1733年）三立书院正式改名“晋阳书院”。重建后的晋阳书院旧址即在现今的太原市公安局院内。自顺治十八年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661~1901）240年间，晋阳书院一直设在侯家巷。1902年成立山西大学堂，大学堂总教习兼中学专斋总理谷如墉，即为晋阳书院最后一任山长，晋阳书院的学生也全部进入山西大学堂。

山西大学堂与“令德堂”书院也有历史渊源。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继任山西巡抚，针对山西“士气衰微而废其学”、“此

时唯苦人才不足”的情况,到任伊始,张即与学使王学庄商议,并会衔入奏,请于太原府署西偏明代晋藩宝贤堂旧址别建精庐,仿阮元学海堂、诂经精舍例,设“令德堂”书院。后因王学庄丁忧去官,张之洞又与新任学使吕凤歧悉心规划,在桥头街觅屋开办(今太原市人民公园)。令德堂课士,仍为传统书院规制,所延聘山长、分校都是对经史古学造诣颇深的儒生,如主讲王轩(洪洞人)为同治壬戌进士,幼治三礼,习许氏《说文》,于地理学、金石考订颇有成就;协讲杨笃(乡宁人)为同治甲子举人,精三礼,尤专训诂。王、杨均为光绪《山西通志》的主要纂修人;协讲杨深秀(闻喜人)为光绪丁丑进士,治朴学,为后来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

1884年,张之洞飭冀宁道详议令德堂章程六条四十二目(载光绪《晋政辑要》卷23,《礼制·学校六》),举凡延请主讲,编立功课,修缮杂支,书籍购置,课卷日记定式刊印,监院教谕,书役斋夫,巡更杂役之责,均一一议立章程,“以期历久可行”。令德堂学生最初仅30人,后扩至50人,陆续增至70人,“其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据载,1885年乙酉乡试,有文能运用许氏《说文》及史学词章具有根底者皆属令德堂肄业生。值得提起的是,戊戌维新高潮期间,令德堂肄业生增至120人,院长屠仁守进行教学改制,添设经济课四门——政治时务、农功物产、地理兵



令德堂创办人张之洞

事、天算博艺，令学生任选一门，广览众参。令德堂与时俱进，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求。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外籍教士安怀珍、刘博第等

强占令德堂为临时教堂，令德堂于是停办，其肄业生后来一律转入新设立的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最初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多承袭令德堂旧制，而山西大学堂创办人之一的谷如墉及教师田应璜、张友桐、董化时等都是令德堂早年的毕业生。

清末书院改学堂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潮流，山西大学堂就是在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的基础上创建的。

5月8日：校庆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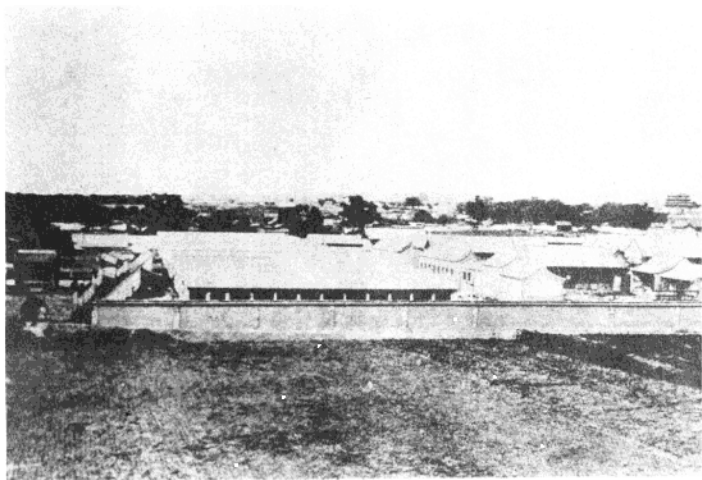
一所学校的校庆日，犹如一个人的生日，都有她确切的年、月、日。在山西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其“身世之谜”不得不考。

校庆日的考订采取由近及远的回溯办法可能最为便利。

1992年山西大学90周年校庆时，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曾出版《群星璀璨话摇篮》一书，内载马兆丰先生《怀念师友忆往事，几度校庆见兴衰》一文。据马老回忆，他曾亲身经历过三次校庆，一为1947年5月举行的45周年校庆；一为1982年10月举行的80周年校庆；一为1992年9月举行的90周年校庆。后两次校庆笔者都曾有幸作为山西大学的一员参与，其规模盛况，各种大型活动，至今记忆犹新，惟庆典活动的标志——由省府官员及各方来宾参加的大会，90周年在9月10日，80周年则在10月26日。9月10日为国家规定的教师节，校庆日与教师节同庆尚可理解，10月26日则不得其解。

值得注意的是，45周年校庆在5月举行，征询马老，知确切日期在5月1日。此次校庆在老校址侯家巷举行，“校庆十分简陋，连个会标都没有，只是举行了一个报告会，参加师生稀稀疏疏，没有什么庆祝气氛”（上揭马兆丰文）。但5月1日却是“身世之谜”的一个重要日期。

查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编《国立山西大学一览》后附《国立山西大学三十六学年度学校历》，其“说明”中明确记曰：“五月



清末山西大学堂全景

一日,校庆纪念放假”。同年,由国立山西大学文学院、法学院合编的《山西大学报·创刊号》也于5月1日出版。校长徐士瑚在“创刊词”中写道:本学报“能于五月一日,本校四十五周年校庆纪念日出刊,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将5月1日作为山西大学校庆日,在山大校史上可能是沿用最长的一个日期。查1943年创刊的《国立山西大学校刊》,直至1947年,每年校庆该刊均有庆祝活动的记载。其中42周年时由全校师生参加的庆祝大会上,教务长严开元、法学院院长张之杰、训导长薛耀庭、经济系主任侯锦铎等均发表讲演(校长徐士瑚因赴克难坡未在校)。侯锦铎的讲演,不仅将山西大学与北京大学比较而论,而且颇为推崇1922年以前“外人办理”时期的山西大学:

山大是次于北大而为全国最早的第二个学校,但

北大前身只是译学馆，论课程完备、灌输欧美文化最早的学校，还要以山大为第一。山大之始，创办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李提摩太之手，当时欲以欧西文化解救我们的一些缺点，但其弊在欧化过深，矫往过正，后来也同时注重我国文化，遂又有进步。首次由李氏选派留洋的学生，毕业归国多在本校授课，大半成一时学术精深的名士，所以在民国十一年以前，就是外人办理的时期，本校是颇负盛誉的。

北大自有北大的优势，山大也有自己的长处，当然不好简单地比附。但侯锦钺先生这番“气壮如牛”的话，恐怕今日吾等晚辈就难以出口了。

再往后溯。查5月1日作为校庆日，早在30年代初年即已确定。1930年5月1日《山西日报》载：“山西大学校王录勋校长，以今日为该校成立28周年纪念日，特于昨日牌示放假一日，以表庆祝，其牌示云：‘查本年5月1日为本校成立28周年纪念日，照章放假一日，以示庆祝，而志不忘，仰各科诸生一体知照，此布。’云云。”按王录勋校长牌示“照章放假一日”，则确定5月1日作为校庆日当还在此前，惜现有资料已无从稽考。

另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将6月26日作为校庆日。老校长徐士瑚在《李提摩太与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载《山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一文中即持此说。其实,1902年6月26日(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是西斋正式开学上课的日期,此时山西大学堂已宣告成立。

问题是,为什么至迟在三四十年代即将5月1日作为校庆日?查遍有关山西大学现有校史资料,对此没有任何明确记载,笔者在此作一大胆推测: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二(1902年6月7日),《中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合同》二十三条由巡抚衙门盖印,中方代表山西布政使吴廷斌、山西大学堂总理谷如墉等,外国代表上海广学会总办李提摩太、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总教习敦崇礼,双方在太原府签字。从此,经过一年多的交涉,双方终于此日就李提摩太筹办之中西大学堂“归入山西大学堂办理”,同时成立中西斋达成协议,随后才有6月26日的西斋开学典礼。时人或据朔望月取农历每月初一为朔日,遂定五月初一为校庆日。又,民国以后阴历改阳历,民间仍是“阳阴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又将阴历五月初一沿用为阳历5月1日,或者干脆懒得去改,径直以阳历5月1日作为校庆日。以此“蛛丝马迹”推测沿续数十年的校庆日,不禁惶然。确否,尚待史料的发现和高明指正。



山西巡抚、山西大学堂
创办人岑春煊

那么，究竟山西大学的校庆日为何月何日？吾意应在1902年5月8日。

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日（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下诏复命“除京师大学堂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

大学堂”（《光绪朝东华录》卷169）。翌年正月，山西巡抚岑春煊向朝廷上奏《设立晋省大学堂谨拟暂行试办章程》共六条，其中第二条“建学舍”云：

省城旧有晋阳、令德两书院，令德逼近衙署，局势偏狭，晋阳在城东南隅，旁多隙地，现已就晋阳基址，派员详加勘估需用工料银两，就地实无从筹划，应请恩准作正开销。惟学堂工竣需时，刻下所调各属生徒陆续至省，未便令其久候，拟先借贡院略加修葺，即于四月初一开办。俟学堂落成，再令迁入。

岑巡抚此折上奏后，光绪帝硃批曰：“选举一条，著管学大臣议奏，余著照所拟办理。”（《清实录·德宗实录》卷498）如此，岑春煊委派山西候补道姚文栋为督办、谷如墉为总理、高燮增为总教习，以文瀛湖南乡试贡院为临时校址于四月初一如期开学。

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一为阳历1902年5月8日。5月8日应是山西大学校庆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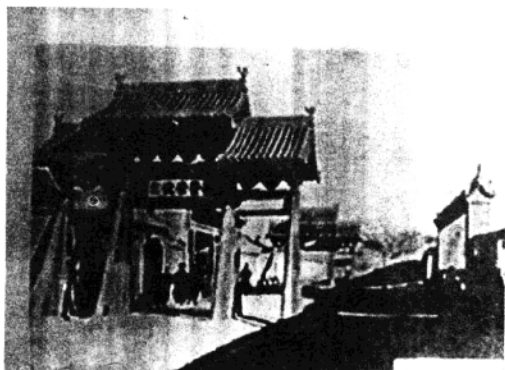
话分两头，3月30日，李提摩太、敦崇礼、新常富一行由上海出发，途经北京、塘沽、正定、怀鹿、平定等地，辗转整整一个月时间于4月30日到达太原。时，山西大学堂已遵旨准备开学上课，双方又经一个多月的磋商讨论，终于达成在大学堂分设中斋、西斋的最后协议，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遂于6月26日开学。此是后话。

中西合璧 好事多磨

近世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传统的文物、制度受到西方文明的直面挑战，西方侵略者挟其坚船利炮渗入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在这一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往往又是代表新的生产力和历史前进方向的进步者，中国人一面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抵抗侵略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了强国富民而向西方不断学习，不断进步。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这是一个痛苦尤烈的过程。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晚清以来中国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思维范式，任何一种新事物在中国的出现，几乎都要经过一番敌对——观望——审视——接受的过程。1902年即已成立的山西大学堂，最初分设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就是此种历史现象的显例，亦真可谓中西合璧，好事多磨。

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新式学校（时称学堂）大多由西方教会势力创办。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给朝野上下以极大震动，京师沦陷，皇室出逃，清政府不得不实施“新政”，以求“振作”。继戊戌期间命省城书院一律改设大学堂后，1901年9月清政府再次重申此令，新任山西巡抚岑春煊以“方今士习浮嚣，危言日出，全赖昌明正学，救弊扶颠”为念，遵旨将原设省城的令德堂书院和晋阳书院撤销，于1902年5月8日成立山西大学堂。首任督办姚文栋，总教习高燮增，总理谷如墉。

清末山西大学堂校门



另一方面,当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又将兵锋指向山西,长城岭、娘子关先后失守,岑春煊急电上海道台,希望时任上海广学会总办、“曾在晋省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来晋负责解决晋省教案与商务问题。1901年5月,李提摩太由沪抵京,并向主持议和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上书《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其中第三条提出:

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银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

李鸿章对此表示赞同,并将开办大学堂、延聘教习、安排课程、管理经费诸事交由李提摩太全权负责。同时,电告山西巡抚岑春煊遵照办理。由于娘子关一带局势尚未平静,李提摩太未能直接到并商谈,便转道返回上海。7月初,耶稣

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教各教会推出教士叶守真、敦崇礼、文阿德等8人为代表，前来太原商讨办理山西教案善后事宜。岑春煊以山西民穷财尽为由，对付银50万两开办大学堂事表示异议。后经李提摩太

“叠次催促，函电往返”，岑春煊遂于9月派洋务局后补知县周之骧赴沪商谈。

周之骧与李提摩太的面谈并不顺利。周之骧对开办大学堂事宜提出四个条件：晋省所出50万两银不称罚款；西教师在校内不得宣传耶稣教；学堂不得与教会发生关系；西教师不得干预学校行政。李提摩太则坚持西人应主持校务，并以东南各省教会学校并无此等限制坚持己见，谈判曾一度陷于僵局。11月，经一再磋商，周之骧将与李提摩太商定的合同草案八条电呈山西巡抚岑春煊。其主要内容是：山西筹银50万两，分期交付李提摩太，开办中西大学堂。十年以内，学堂课程及延聘教习、考选学生，均由李主持；十年期满，学堂房屋及一切书籍仪器，概交晋省，并不估价；学堂延请总管及大教